

#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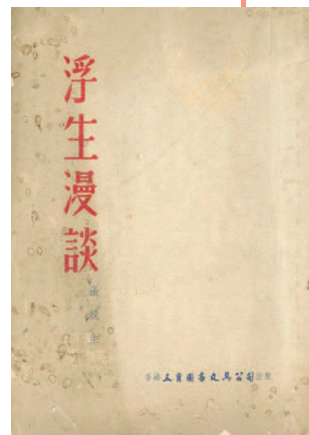
## ——从卢梭信徒张竞生的败走麦城说起

陈平原

真正给与张竞生致命打击的,不是“传统的保守势力”,而是同样关注妇女问题及性道德的新文化人。因他们特别担心,这位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张竞生,将这个好题目给彻底糟蹋了。这就好像一头莽撞的大象,出于好奇,闯进了瓷器店,悠然转身离去时,留下了无法收拾的一地碎片。

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张竞生(1888—1970)不可,与其选择“性学专家”,不如说是“卢梭信徒”。作为北大哲学教授,竟然凭借薄薄一册《性史》,赢得生前无数骂名,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无限风光,这其实是不虞之誉(毁)。十年前,我为张培忠著《文妖与先知——张竞生传》撰写序言,提及不仅学问与立场,甚至包括性情与行为方式,最合适作为卢梭信徒或私淑弟子的,莫过于张竞生:“从早年的博士论文《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》(1919),到北大教书时的专著《美的人生观》、《美的社会组织法》,到离开学界后的译述《卢骚忏悔录》《梦与放逐》《歌德自传》《烂漫派概论》《伟大怪恶的艺术》,一直到晚年撰写‘半自传式的小品文’《浮生漫谈》《十年情场》《爱的漩涡》等,几乎张竞生所有的著译,都隐隐约约可见卢梭的影子。”

同是北大哲学教授,美国博士胡适引进杜威,名满天下,引领风骚数十年;法国博士张竞生信奉卢梭,为何举步维艰,成为一颗划过天际、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?这涉及新文化人努力的方向,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天花板。终其一生,张竞生最为春风得意的,莫过于北大任教那五年(1921年10月—1926年6月)。授课之余,在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起爱情大讨论,提出爱情四定则,出版《美的人生观》;以哲学教授身份征集并出版惊世骇俗的《性史》,一时间举国哗然。这些举动虽被保守人士视为“国民公敌”,但新文化人大体上是支持的。转折在于1926年6月南下上海,创办关注妇女问题与性教育的《新文化》月刊以及让人充满遐想的美的书店。此后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,虽未完全向世俗社会投降,始终昂起头颅,但不管是翻译世界名著,还是筹划乡村建设,都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历史是如此无情,主要不是看当事人的志向,而是看其实际业绩。张竞生留在思想史或文化史上的,确实只是“性学专家”。至于



从左至右:《新文化》月刊、《爱情定则讨论集》、《浮生漫谈》

哲学家、美学家、文学家、社会学家、乡村建设实践家云云,只能说有此潜质与意愿,最终因外在环境以及个人因素而没能真正实现。

在这个意义上,周作人称“张竞生时髦的行运到十五年底为止”(岂明:《时运的说明》,1927年2月26日《世界日报副刊》)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虽然张竞生也曾奋起反击,但周氏一语成谶。此后的张竞生,左冲右突、上下求索,始终无法摆脱“性博士”的恶名。

对我来说,谈论这位风光五载、落拓半生的北大前辈、家乡贤达,褒贬之间,需要史家的清醒,而不是“理解的同情”。其中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:“真正让张竞生‘无地自容’的,是占据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主流地位的五四新文化人及其后学。”当初一笔带过,这回借为《张竞生集》作序,进一步阐发。因为,这是理解张竞生之所以长期被扭曲与遗忘的关键,也是让其重新浮出海面所必须闯过的重要关卡。

**查** 蔡元培 1921—1926 年日记,提及不少学界人士的名字,就是没有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,而此前他俩在法国是有过交往的。1934年蔡元培在《东方杂志》第31卷1号上发表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

历》,提及其着意聘请的不少文理科教授:“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,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,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,没有人肯讲美学。十年,我讲了十余次,因足疾进医院停止。至于美育的设备,曾设书法研究会,请沈尹默、马叔平诸君主持。设画法研究会,请贺履之、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;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。设音乐研究会,请萧友梅君主持。均听学生自由选习。”其实,最接近蔡先生美育趣味的,应该是本校哲学系教授张竞生。后世论者谈及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如何逐步推广,提到很多名字和著述,可就是没有张竞生及其《美的人生观》《美的社会组织法》(邓牛顿在论及“美育运动的实绩”时,提及许多名字,同样没有张竞生,参见《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》16—20页,上海文艺出版社,1988年。虽未正面提及,但在作为附录的“中国现代美学著译要目”中开列《美的人生观》《美的社会组织法》,已经是个例外了)。提倡“美治精神”,拓展“美间”、“美流”与“美力”,甚至创立“美的政府”,以求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(张竞生在《美的社会组织法》[北京大学出版社,1925年]之《导言》中称:“倘若此书长此终古,作为乌托邦的后继呢,则我也不枉悔,因为它虽不能见诸事实,可是我已得

到感情与舒怀了。”)——此等乌托邦论述,不管你如何评价,与蔡元培的“以美育代宗教”是有亲缘关系的。只可惜蔡先生不愿提及,后世的研究者也充耳不闻。

北大同人中,热衷于译介葛理士,并撰有《猥亵的歌谣》(1923)、《女裤心理之研究》(1924)、《与友人论性道德书》(1925)等的周作人,最有可能成为张竞生的同盟军。但查1921—1926年的周作人日记,没有张竞生的踪影,其中1924年底附录有“知友一览”,区区十二人,自然更轮不到张博士了。不过,同样关注性心理与性教育,竭力破除世人的性禁忌,这方面,周作人确实给过张竞生很大的支持(1925年5月北京大学印刷课第一版《美的人生观》上,张竞生《序》开篇引录周作人的《沟沿通信之二》,结尾则“我极感谢周作人先生公正的批评”。

2014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重印《性史》,封底引周作人的话,可人家谈的不是《性史》,而是《美的人生观》——“前几天从友人处借来一册张竞生教授著《美的人生观》,下半卷讲深微的学理,我们门外汉不很懂得,上半卷具体的叙说美的生活,看了却觉得很有趣。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,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

乐的旗帜,大声叱咤,这是何等痛快的事。”(开明:《沟沿通信之二》,1924年8月27日《晨报副刊》)周作人还有一篇谈张竞生的文章,但评价已大为逆转:“张竞生先生我是认识的,他做《美的人生观》时的大胆我也颇佩服,但是今年他在《新文化》上所讲的什么丹田之类的妖妄话,我实在不禁失望。”(岂明:《“新文化”上的广告》按,《语丝》第124期,1927年3月25日)1960年代,周作人撰《知堂回想录》,其中“北大感旧录”那组文章很动人,分别谈论辜鸿铭、刘师培、黄侃、林损、许之衡、黄节、孟森、冯汉叔、刘文典、朱希祖、胡适、刘半农、马廉、钱玄同、蔡元培、蒋梦麟、陈独秀等;若再加上“北京大学”、“蔡子民”、“林蔡斗争文件”、“卯字号的名人”、“三沈二马”、“二马之余”等节,周作人谈北大同事的文章实在够多,可就是没有张竞生。

检索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《胡适全集》,总共44卷,第21卷收录了初刊1929年《新月》第2卷第6—7号合刊的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》,引述张竞生但语带嘲讽。第29卷三次提及张竞生,那是1922年3月5日、5月30日和6月2日的日记,属于事务性质,不带评价。值得引录的,只有第31卷的1928年6月3日日记:“北大学生聂思敬来谈。他带了张竞生一封信来。竞生也有大规模的译书计划。此意甚值得研究,不可以人废言。”后面张贴了《张竞生的一封信》,谈的是译书计划:“据竞生个人实地在书店及编辑部经验所得,断定如有十万元资本,以之请编辑七八十位,按时译书,则数年内可将世界名著二三千本,译成中文,其关系于我国文化至深且大。”这里的“不可以人废言”,已经蕴含“此人声名狼藉”这一前提。这就难怪胡适日后口述自传,只字不提当年北大哲学系同事张竞生。

胡适与张竞生的精神气质及学术路数完全不同,不提及